

霍氏译学结构图的国内研究综述

刘雨晴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翻译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自图里用结构图呈现出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想以来, 国内学者对这一译学结构图展开研究, 使霍氏译学结构图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本文通过梳理文献, 分析了国内对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的研究的三大特点, 加以探讨国内对翻译研究框架的研究优势与不足, 厘清我国翻译界关于霍氏译学图研究的状况, 以便后续学者更精准地利用有限资源推动关键领域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国内翻译研究; 霍姆斯; 图里; 翻译学科构架图

1 引言

1972年, 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 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 发表了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演讲。然而, 霍姆斯的思想并未立即得到广泛的认可。直到1988年, 该文经过精心修改与扩充后被收录进论文集, 霍姆斯的翻译学思想才逐渐为翻译学界所熟知, 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李龙兴和王宪 (2020) 认为该论文详尽地探讨了翻译学的研究目标、范围以及学科内部的划分, 提出了将翻译研究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远见卓识, 因此被众多翻译学者誉为“翻译学科的创建宣言”。随后, 图里 (Toury) 更是以结构图的形式呈现了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想, 这一举动无疑使得该构想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2 国内对霍姆斯 / 图里的翻译学研究结构图的研究特点

图里所创作的结构图, 凭借其高度的概括性、简洁性和直观性, 在霍姆斯翻译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结构图不仅捕捉了霍姆斯翻译学框架的精髓, 更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了霍氏相对复杂的翻译学思想。正因为图里的结构图具有如此强大的解释力, 国内众多学者在介绍、评论、修改或深化霍姆斯的翻译学构架时, 都选择以该图为起点展开研究, 代表学者有谭载喜、张美芳、张南峰、杨

自俭、曹明伦、刘宓庆、滕梅、朱健平等。

2.1 沿用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

2000年, 我国学者张美芳向中国翻译界介绍了霍氏构架, 她以图里的绘图为参照, 但并未修正此图。同年, 张南峰在讨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时, 也采用了图里的霍氏译学构架作为依据。此外, 马会娟与管兴忠 (2000) 也以此图为前提, 与张南峰就中国译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霍姆斯 / 图里的翻译学架构图常被用来作为具体翻译研究项目展开的出发点, 研究者常常在这个以分工明晰而广受赞誉的翻译学架构图中寻找各自研究课题的位置。学者肖开荣 (2012: 1) 的博士论文开篇便称“本研究定位于霍姆斯翻译学图谱中的‘过程导向’描述翻译研究。

学者褚凌云 (2016) 通过梳理国内外创译翻译方法的研究, 旨在明确创译在霍姆斯和图里翻译结构图中的定位, 深入解析其本质, 以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褚凌云认为, 创译的本质在于翻译实践与跨文化实践的融合, 因此, 在结构图中, 应将创译视为应用翻译学的二级分支进行思考。随后, 他发现此种定位存在不妥, 如创译的文本和效果无法归属于应用翻译学的二级分支一概而论。根据创译的文本特点和特殊目的, 褚认为亦可将其归于描述性翻译学下的

产品、功能导向研究。这种模棱两可的定位一定程度上说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霍姆斯的描述无法涵盖该领域出现的新发展, 也说明该图本身存在各分支关系界限不清的问题, 但学者对此并未过多叙述。

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无疑为翻译研究者找准自身研究定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此图本身是否存在缺陷呢? 为何部分学者无法在此图中找到自身研究定位? 存在怎样的缺陷? 为什么存在缺陷? 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又如何? 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2.2 对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提出质疑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不少学者认为该图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 分支存在遗漏缺陷。如刘宓庆 (2002) 指出, 霍姆斯的划分“漏掉了‘翻译史’; 潘文国 (2002) 意识到霍氏提及的“翻译学‘学’”和“学科方法论”没有放进图里的框架; 罗列和穆雷 (2010) 认为“漏掉”的还不止翻译史这一个领域; 滕梅 (2014) 发现图中应用研究下缺失“翻译政策”分支。

其次, 分支间分类标准不一。罗列 (2010) 发现结构图中描述性研究本身是一种研究方法, 但其下面的分支领域却又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划分; 高雷 (2013: 111) 认为霍氏的“分类标准界定的不很

清楚,在理论建构中缺乏足够的描写力、解释力和预测力”;张冬梅(2015)从讨论翻译学科实证性的角度出发,指出译学的新发展使得部分研究的关注对象超出霍姆斯认为的翻译学是一门实证学科的范畴,规约性与描写性因素可同时存在于某些翻译研究中,但由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界限的模糊,此类翻译研究难以找到立足点。不难看出,在霍氏译学架构图中,翻译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目标与翻译学学科分支的划分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从而导致许多分支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

再者,单线化图示未能体现霍姆斯所倡导的各分支间的辩证关系,存在误构。学者们通过深读霍氏原文,发现霍氏笔下的理论翻译研究、描述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三个分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图里用单向箭头表示三个分支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与霍氏背道而驰,也让读者理解霍氏原意走了弯路。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缺陷?学者们进一步对此展开分析,笔者认为可分为主观与客观原因。主观来看,一是霍姆斯与图里的观点不一致,二是图里对霍姆斯原文理解部分有误。就缺失的翻译政策而言,张美芳比较了霍姆斯与图里对翻译政策的定义。她发现前者强调翻译政策研究的应用价值,后者则强调翻译政策与翻译规范的关系。而在翻译政策由谁制定这个问题上,两位学者也有分歧。图里不认同霍姆斯关于翻译政策由翻译研究者来制定的观点。除观点上各执其词之外,图里也没有完全吃透霍姆斯的理念。例如霍姆斯曾专用一章节介绍的翻译政策遭到了图里的忽视,霍在原文末尾呼吁学者们应引起重视的翻译研究自身的研究也没有被纳入图里的架构图中。客观来看,外部环境的迅速发展也间接影响了某一分支在构架图中的缺失,如翻译职业、翻译服务业、译学

术语、相关科技及网络平台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超出了霍姆斯最初对翻译领域的描述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大学的朱健平教授(2018)通过对照霍氏原文,指出图里制作的霍尔姆斯翻译研究地图具体存在以下五大问题:一是主题构架内容不完整;二是描述翻译研究未能体现各分支的研究过程的最终目标;三是局部翻译研究未能完整再现各分支所包含的下级分类;四是应用研究内容不全;五是误构了各分支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缺陷,为译学研究构架图打开了新的思路,但可惜的是,部分学者并未对此进行修正或重制,无法为翻译学研究构架提供新的图谱,以致研究者无法置身于新的完整的译学结构中展开研究,缺少理论支撑。

2.3 调整、重制图里的霍氏译学结构图

霍姆斯所构建的翻译研究理论框架具备开放性,有待后续学者进行修改、补充和进一步拓展。许多外国学者已认识到完善霍姆斯图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范德皮特教授(2017)针对霍姆斯译学图中分类不一致的问题,提出分类标准不应过于单一和简化,而应结合研究目的、方法和对象三种标准来明确研究特性。韩国学者李香(2017)则在系统性梳理翻译学在韩国的发展近况后,基于霍氏译学框架,为韩国译学研究描绘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译学图谱。

国内学者受此启发,也纷纷着手调整、重制图谱,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基于霍氏图谱,进行简单补充。如学者韩庆果(2003)基于翻译研究现实,将翻译政策列入应用翻译学下属分支,重视外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滕梅(2012)不仅还原了霍姆斯最初的想法,将翻译政策与译员培训、翻译工具和翻译批评平行,共同隶属应用翻译学下级分支,还拓展了翻译政策研究的内涵,进一步分为宏观与具体政策问题的研究。但上述两位学者对于新列分支的具体研究内容并未详细说明,同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2) 从不同角度出发,重新绘制图谱。刘宓庆(2002)基于中英双语翻译行为的经验观察,增添了翻译史、翻译思想研究和跨学科理论,并通过实、虚线及括号注释展现分支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刘宓庆在论文中还特意强调了中国的译学研究应注重自身特色,不应盲从前人。这样的观点启发后续学者结合中国翻译实际来讨论架构图的设计,代表论文有滕梅(2014)的《翻译政策研究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一文。

部分学者意识到翻译学科内部的发展对原来的霍氏经典结构图也带来了一定冲击。常言道“牵一发而动全身”,翻译研究方法与翻译理论流派发生的细微变化导致原本包含叙述式概念表达的简单构图无法满足研究者们探寻、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张雪淞(2016)从翻译伦理角度出发,尽可能列出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家的学说,层层推演,总结出一套较为直观的译学框架结构图。值得肯定的是,张考虑到翻译开始前及翻译产品面世后的整个过程都受文化要素的影响,从而将文化群体要素纳入结构图中,表现出翻译研究范围之大。但张雪淞只是将霍姆斯、奈达等翻译理论杂糅摆进结构图中,所划的分支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也缺乏对各个理论间联系与区别的阐释。

詹露(2017)的《基于实证数据的霍尔姆斯翻译学学科框架再议》一文,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部分未能归类的文本进行分析,以反思固有的历史理念,对



翻译学科框架的完善提出建议。该研究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与时俱进,逐步提升了翻译研究的网络化思维、数据思维和复杂性思维。

朱健平教授(2020)发现杨自俭、曹明伦等前辈学者所设计的译学构架图大都未能全面考虑到翻译研究学科构架图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在谭载喜构想的译学框架中,虽已初见内容结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这三大基本要素,但他忽视了要素间的相互联动的关系。朱健平在《构建以构成要素为基底的翻译研究学科框架》一文中,阐述了翻译学科构成的五大基本要素,旨在回答翻译研究是什么、怎样研究、用哪些理论、有哪些研究以及从什么层面展开这五大问题,理清框架图这一学科研究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朱健平的设计不仅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分类逻辑混乱的问题,还将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考虑在内,拓展了学科视野。

3 结语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可以总结出国内对霍氏译学结构图的研究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优势有以下两点:一、研究方法与手段不断更新。随着各种软件、信息处理工具及实证分析方式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数据化的分析使从客观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成为可能。不少学者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文献进行收录整理,绘制可视化图谱进行分析。二、研究战略从放眼世界到立足本土。在重构译学图谱时,国内学者逐步聚焦中国翻译学的侧重研究。中国翻译学的侧重研究也由个体性的零碎研究逐步走向有组织、有分工的系统研究。

通过对国内对霍氏译学结构图的研究进行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当前研究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只做简单的补充,层

次较为单一,没有考虑多种因素;二是对霍氏框架把握不准,未意识到霍氏框架分类标准不一致,在此基础上的徒增分支只会让框架更混乱;三是仍存在对霍氏译学图的大量误用;四是虽已提出一些新译学架构图,但影响力较小,使用者较少。

因此,我们呼吁研究者们未来不断更新信息处理技术,运用大数据软件来对译学结构图展开深入研究,寻找新的突破点。同时,立足本国国情,切忌“拿来主义”,追寻中国译学结构图的新道路,不拘泥于译学框架的概述与评价,而是把目光转向用译学理论来审视国家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翻译实践等应用型研究,让译学结构图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Holmes, J.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 Amsterdam: Rodopi, 1988.

[2]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3] 褚凌云. 创译的本质与创译在霍姆斯、图里翻译结构图中的定位[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12):45-46.

[4] 高雷. 翻译本体与翻译学体系[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5):109-112.

[5] 范德皮特. 重绘翻译研究图谱——翻译研究本体建构[J]. 翻译界, 2017(2):154-157

[6] 韩庆果. 翻译学研究的框架[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90-93.

[7] 李龙兴, 王宪. 霍姆斯翻译研究框架的拓展及对译学发展“转向”

的反思[J]. 外语与翻译, 2020(1):1-8+97.

[8] 李香. 霍氏译学图框架下的韩国翻译研究图谱[J]. 翻译界, 2017(2):157-159.

[9] 刘宓庆. 关于翻译学性质与学科架构的再思考[C]. 汉英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128-137.

[10] 罗列, 穆雷. 翻译学的学科身份: 现状与建设[J]. 上海翻译, 2010(4):11-15.

[11] 马会娟, 管兴忠. 试论中国翻译学——兼与张南峰先生商榷[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3):12-18.

[12]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2):4.

[13] 滕梅. 翻译政策研究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J]. 上海翻译, 2014(1):35-39.

[14] 肖开容. 翻译中的框架操作[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15] 张冬梅. 翻译学的实证性学科定位再思——霍姆斯、图里翻译学架构图思考问题之一[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6):23-29.

[16] 张美芳. 翻译学的目标与结构——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介评[J]. 中国翻译, 2002(2):4.

[17] 张南峰.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 中国翻译, 2000(2):6.

[18] 朱健平. 完整再现霍尔姆斯翻译研究学科构架图[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4):75-83.

[19] 朱健平. 构建以构成要素为基底的翻译研究学科构架[J]. 中国翻译, 2020(1):19-30+188.